

怨愤、苦痛背后的实录坚守

——不容忽视的《史记》美颂艺术

□黄晓芳

(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,陕西 西安 710119)

【内容摘要】不囿于统治者及世俗好恶,且能超越一己怨愤,司马迁对实录进行了彻底坚守。《史记》的美颂,无畏无私,实事求是,充满正义和骨气,是实录不容忽视的重要部分。首篇选择示美颂、客观叙事寓美颂、他人肯定寄美颂、“太史公曰”表美颂,构成《史记》美颂艺术的表现方式。运用互见法、创体后破体,凸显《史记》美颂艺术的实录特质。先秦美颂传统的陶染、汉代美颂风尚的影响、最初创作动因的诱发,促成《史记》美颂艺术的形成。

【关键词】《史记》;美颂艺术;表现方式;实录特质;原因。

【作者简介】黄晓芳,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2级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,研究方向: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。

《史记》草创未就之际,司马迁不幸遭遇李陵之祸,饱尝统治者的残酷无情,深感世道不公、世态炎凉,他内心激荡着浓烈的怨愤、悲痛之情。在生命的苦痛中,司马迁一直坚守实录原则,不仅不囿于统治者及世俗的好恶,且能超越一己怨愤,不以自身好恶掩盖历史真实,始终实事求是地书写历史。如果说面对严酷统治和世俗洪流,太史公对黑暗丑陋现象的批判讽刺是实录最为闪亮的部分,那么面对自身怨愤和苦痛,太史公并未消极否定一切,他对真善美的歌颂褒扬也是实录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无畏无私的批判和美颂,共同彰显了司马迁对实录的彻底坚守。正因为司马迁能做到“不虚美,不隐恶”^[1]“爱而知其丑,

憎而知其善,善恶必书”^[2],亦即是非分明,所以《史记》才有如此巨大的魅力。其实,有时对历史人物进行合乎实际的称颂,也需要勇气,如对项羽、陈涉,以及游侠、刺客等人物的肯定就如此。赞美颂扬与批判讽刺一起增添了《史记》实录的不朽光辉,也展现了司马迁卓越的史德、史学、史识、史才。怨愤、苦痛中的批判讽刺较易理解,学界关注较多。而同样情境下太史公实事求是的褒美,却常常被忽略,以至于美颂艺术被遮蔽,这不利于多角度、全方位理解实录,故本文拟对《史记》的美颂艺术进行探讨。

一、《史记》美颂艺术的表现方式

司马迁对德治的赞颂,对人物高尚道

德和美好品格的褒美,对人物历史功绩的肯定,对大一统的宣扬等等,共同构成了《史记》丰富多彩的美颂内蕴。《史记》的美颂以多种方式呈现,主要有以下四种:

1. 首篇选择示美颂。以人物传记为主的本纪、世家、列传三种体例对首篇的选择,别具深意。本纪首篇是《五帝本纪》,五帝为黄帝、颛顼、帝喾、尧、舜,在司马迁笔下,五帝是古代帝王的榜样,他们圣明贤德,仁义礼让,智慧超群,能力非凡,一心为民,不辞劳苦,造福天下,功德显著,其德治、功业、人格以及尧舜的禅让,都是太史公极力颂扬的。五帝是司马迁心目中帝王的理想典范。世家首篇为《吴太伯世家》,司马迁对太伯、季札让国避位的义行和美德大加赞赏,热情歌颂,“以吴太伯作为三十世家之首,这个处理本身就是司马迁对太伯的最高褒奖”^[3]。列传首篇为《伯夷列传》,杨慎以为:“《尚书》首《尧典》《舜典》,《春秋》首隐公,世家首太伯,列传首伯夷,贵让也。”^[4]《太史公自序》称:“末世争利,维彼奔义;让国饿死,天下称之。作《伯夷列传》第一。”^[5]《伯夷列传》居七十列传之首,伯夷、叔齐的“让”之美德、坚守节义之行,都是太史公所称颂的。《史记》对各体首篇的选择是慎重而富有深意的,显示出太史公对五帝、太伯、季札、伯夷、叔齐的褒美之意。

2. 客观叙事寓美颂。司马迁在撰写《史记》人物传记各篇时,于客观叙事中体现美颂之意。《夏本纪》中写禹:“乃劳身焦思,居外十三年,过家门不敢入。薄衣食,致孝于鬼神。卑宫室,致费于沟洫。陆行乘车,

水行乘船,泥行乘橇,山行乘橰。左准绳,右规矩,载四时,以开九州,通九道,陂九泽,度九山。”^[6]在这种客观叙事中,体现出太史公对治水英雄大禹艰苦奋斗的歌颂,为了能治水成功,大禹历经艰辛、不辞劳苦,其精神令人敬佩。《魏公子列传》写信陵君:“公子为人仁而下士,士无贤不肖皆谦而礼交之,不敢以其富贵骄士。士以此方数千里争往归之,致食客三千人。当是时,诸侯以公子贤,多客,不敢加兵谋魏十馀年。”^[7]信陵君贤明仁义、礼贤下士的美德于客观叙事中得以颂扬,字里行间流露着褒美之意。《赵世家》中叙述程婴、公孙杵臼为救赵氏孤儿挺身而出,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的故事,将他们坚守忠义、舍己救人、勇敢无畏、信守诺言等品质表现得淋漓尽致,震撼人心,极具感染力。《张释之冯唐列传》通过叙述张释之对惊吓皇帝车马之人依法仅处罚金,并未按皇帝的意思加重处罚,对盗高庙座前玉环之人依法判处死刑,并未逢迎皇帝之意灭三族,体现出张释之执法的公正严格和不阿权贵的精神。

3. 他人肯定寄美颂。《史记》中还常常通过他人的肯定来显示赞美之意。《殷本纪》中写商汤网开三面,“诸侯闻之,曰:‘汤德至矣,及禽兽。’”^[8]太史公对商汤仁德的赞美是通过天下诸侯之言来表达的,商汤德及禽兽,以德服天下,这是他能够灭夏建商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又如《刺客列传》中,豫让为了替智伯报仇,“乃变名姓为刑人,入宫涂厕,中挟匕首,欲以刺襄子”,刺杀未遂而被擒,赵襄子的部下要杀豫让,这时

赵襄子说了一番赞扬豫让忠勇的话：“彼义人也，吾谨避之耳。且智伯亡无后，而其臣欲为报仇，此天下之贤人也。”几经刺杀不成后，豫让伏剑自杀，“死之日，赵国志士闻之，皆为涕泣”^[9]。豫让历经艰辛刺杀赵襄子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报答智伯的知遇之恩，谱写了一曲“士为知己者死”的壮歌，司马迁通过赵襄子之言及赵国志士“皆为涕泣”的举动，对豫让报答知遇之恩的忠义进行了肯定和褒扬。

他人肯定还体现在有褒美之意的民歌谣谚之中。民歌谣谚增加了《史记》的丰富性和生动性，对人物的褒贬也蕴含其中。如所载《画一歌》：“萧何为法，颡若画一；曹参代之，守而勿失。载其清净，民以宁一。”^[10]萧何、曹参二人在汉初先后为相，他们均能顺应汉初社会发展的实际，治理有方，合乎民意，得到百姓歌颂。又如所载谚语“得黄金百，不如得季布一诺”^[11]，季布为人仗义，讲信用，这则谚语就是对季布信守承诺的称颂。

4.“太史公曰”表美颂。司马迁作《史记》是要“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，成一家之言”^[12]，他以“太史公曰”的方式，表达对历史人物、事件的看法和评价，寄寓着自己的世界观和历史观。司马迁对人物的赞美称颂也在“太史公曰”中体现出来。《孔子世家》：“太史公曰：‘《诗》有之：‘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。’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……孔子布衣，传十余世，学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，中国言《六艺》者折中于夫子，可谓至圣矣！’”^[13]司马迁直接抒发了对孔子的赞美和仰慕之情。《孝文本纪》：“太史公曰：

孔子言‘必世然后仁。善人之治国百年，亦可以胜残去杀’。诚哉是言！汉兴，至孝文四十有余载，德至盛也。廩廩乡改正服封禅矣，谦让未成于今。呜呼，岂不仁哉！”^[14]司马迁对汉文帝的德政和谦让仁义进行了高度评价和赞扬。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“太史公曰”中称：“相如一奋其气，威信敌国，退而让颇，名重太山，其处智勇，可谓兼之矣！”^[15]司马迁对蔺相如机智勇敢、以国家为重的品德极为赞赏。《田儋列传》“太史公曰”中赞扬田横气节：“田横之高节，宾客慕义而从横死，岂非至贤！”^[16]司马迁以“太史公曰”的方式，对值得称颂的历史人物表达着由衷的赞美。

二《史记》美颂艺术的实录特质

阿谀奉承的虚假美颂历来令人不齿，应该杜绝。而充满正义和骨气的合乎实际的美颂，则具有真正打动人心的力量。《史记》的美颂，体现出司马迁的一身正气、勇气和骨气，也体现出司马迁极具责任感的撰史态度和实事求是的精神，千载之下，仍震撼、鼓舞人心，实录可谓功莫大焉。实录不仅是司马迁秉持的原则，也是《史记》美颂艺术的特质。《史记》美颂艺术的实录特质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：一是运用互见法；二是创体后破体。

1. 运用互见法。司马迁运用互见法使褒美与实录兼具，互见法有效捍卫并体现了《史记》美颂艺术的实录特质。汉文帝是司马迁所赞颂的帝王，《孝文本纪》对汉文帝的仁德、谦让等进行了歌颂，可谓字

里行间流露着褒美之意。其实汉文帝也做过与仁德相违之事,如对淮南王的做法,但《孝文本纪》并未载此事。司马迁既要赞美汉文帝,又要坚守实录原则,使用互见法,体现出《史记》美颂的实录特质。太史公将汉文帝处置淮南王之事载入《淮南衡山列传》:“尽诛所与谋者。于是乃遣淮南王,载以辎车,令县以次传。是时袁盎谏上曰:‘上素骄淮南王,弗为置严傅相,以故至此。且淮南王为人刚,今暴摧折之,臣恐卒逢雾露病死,陛下为有杀弟之名,奈何!’上曰:‘吾特苦之耳,今复之。’县传淮南王者皆不敢发车封……乃不食死。”袁盎坦诚劝谏,说明事理,可知汉文帝是在非常清楚事态的情况下仍然做出惩罚决定的,对同父异母的亲弟弟——淮南王刘长之死,汉文帝难辞其咎,此传中还载录了《民为淮南厉王歌》:“一尺布,尚可缝;一斗粟,尚可舂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。”^[17]通过这首歌,将事件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清楚呈现出来,民众对于汉文帝处理淮南王的做法是颇有微词的。这就使美颂与实录均得以实现。又如《魏公子列传》全篇旨在褒扬信陵君的仁义、礼贤下士的美德,司马迁对信陵君的贤明、仁德是大加赞美的。但信陵君也有与仁义、礼贤下士相悖之事,《范雎蔡泽列传》记载,魏相魏齐因与秦相范雎有仇怨而逃亡,赵相虞卿为救魏齐,解相印与其一起逃亡,走投无路之际,想通过信陵君去楚国。

信陵君闻之,畏秦,犹豫未肯见,曰:“虞卿何如人也?”时侯嬴在旁,曰:“人固

未易知,知人亦未易也。夫虞卿蹑屣檐簦,一见赵王,赐白璧一双,黄金百镒;再见,拜为上卿;三见,卒受相印,封万户侯。当此之时,天下争知之。夫魏齐穷困过虞卿,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,解相印,捐万户侯而间行。急士之穷而归公子,公子曰“何如人”。人固不易知,知人亦未易也!”信陵君大惭,驾如野迎之。魏齐闻信陵君之初难见之,怒而自刭^[18]。

向来以礼贤下士著称的信陵君,此时竟然因畏惧秦国而“犹豫未肯见”,经侯嬴一番劝说,感到惭愧,才去迎接,却为时已晚,魏齐的自刭与信陵君起初的态度密切相关。此事不载于《魏公子列传》,而载于《范雎蔡泽列传》,这也是运用互见法使赞美与实录有机结合,体现了美颂艺术的实录特质。

2. 创体后破体。司马迁创立五体结构,为后世的史书体例树立了典范。王鸣盛认为:“司马迁创立本纪、表、书、世家、列传体例,后之作史者,递相祖述,莫能出其范围。”^[19]赵翼云:“司马迁参酌古今,发凡起例,创为全史。本纪以序帝王,世家以记侯国,十表以系时事,八书以详制度,列传以志人物,然后一代君臣政事,贤否得失,总汇于一编之中。自此例一定,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,信史家之极则也。”^[20]《史记》中的本纪、表、书、世家、列传共同构成了一个宏大的体系,体例结构的安排蕴含深意。《太史公自序》中称:“网罗天下放失旧闻,王迹所兴,原始察终,见盛观衰,论考之行事,略推三代,录秦汉,上记

轩辕,下至于兹,著十二本纪,既科条之矣。并时异世,年差月明,作十表。礼乐损益,律历改易,兵权山川鬼神,天人之际,承敝通变,作八书。二十八宿环北辰,三十辐共一毂,运行无穷,辅拂股肱之臣配焉,忠信行道,以奉主上,作三十世家。扶义倜傥,不令己失时,立功名于天下,作七十列传。”^[21]《史记》中选择历史人物进入何种体例,绝非随意,而是深含褒贬之义的。尤其是一些特殊人物的破例现象,更突出体现了太史公的褒贬思想。例如,项羽并未称帝,况且项梁之前还曾立了楚王熊心,楚王熊心入关后还被尊为义帝,但司马迁却将项羽列入本纪,置于汉高祖刘邦的本纪之前,相比之下,楚王熊心则不仅没有进入本纪,而且连进入世家的机会都没有,司马迁只是在《项羽本纪》中将其附入而已,这并非偏见,而是符合历史发展实际的。《项羽本纪》论赞中云:“然羽非有尺寸,乘势起陇亩之中,三年,遂将五诸侯灭秦,分裂天下,而封王侯,政由羽出,号为‘霸王’,位虽不终,近古以来未尝有也。”^[22]项羽是当时天下大势的真正主宰者,是反秦斗争中的关键英雄人物,是历史发展的真正推动者,楚王熊心虽名为楚王,为义帝,却是徒有其名,司马迁对历史人物的选择完全是从历史实际出发的,将项羽列入本纪,是对项羽历史功绩的充分肯定和褒显。又如孔子只是布衣,未曾称王称侯,司马迁却为孔子立世家,这是对孔子历史功绩的一种无声的赞扬和歌颂。再如陈涉是反秦起义的发难者,称王不终,而司马迁却为陈涉立世家,则不仅仅是对历史的

真实记录,其中也包含着太史公对陈涉发难之功的充分肯定和颂扬。司马迁创立五体,创体后又勇于破体,一切从历史实际出发,对于徒有名位之人不予选择,对于实有功绩之人大胆择入,这正体现了司马迁对实录的坚守,美颂艺术的实录特质由此可见一斑。

三《史记》美颂艺术的形成原因

《史记》的美颂艺术,既是对先秦美颂传统的继承,又受汉代美颂风尚的影响,同时,也与《史记》的创作动因息息相关。

1. 先秦美颂传统的陶染。中国文化中的美颂传统由来已久,在文学中亦早有反映。刘毓庆以为:“中国文学从其发轫之日起,便是以颂德为主要特征的。如果说中国神话对于英雄神祇的颂赞,那只是‘雅颂’文学的萌芽。那么有周一代的《雅》《颂》诗歌,便是雅颂文学正式降生的标志。”^[23]中国古代神话中对神话英雄的歌颂和赞美,对中国文学美颂传统的形成有重要的启示作用,而《诗经》中的雅、颂则将美颂传统产生的步伐大大加速,并促使这种传统正式生成。《诗经》在先秦时代就广泛流传,春秋战国大量的引诗赋诗,扩大了《诗经》的流传范围,到了西汉初期,又被立于学官,是五经之首。司马迁博学多识,“百年之间,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”^[24],他对中华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。《诗经》的广泛传播,对文学、文化的影响,司马迁自然是非常熟悉的,他在《史记》中就多次引用《诗经》诗句,其中包括雅、颂诗句,如:“莫其德音,其

德克明,克明克类,克长克君。王此大邦,克顺克俾。俾于文王,其德靡悔。既受帝祉,施于孙子。”^[25]“陈锡载周。”^[26]“思文后稷,克配彼天,立我蒸民,莫匪尔极。”^[27]“戎狄是膺,荆荼是徵。”^[28]等等。陈桐生指出:“司马迁所述《诗经》中的颂美之诗的比重是刺诗的一倍以上。”^[29]“忽视了《史记》诗学观中的颂美内容,也就等于阉割了《史记》的理想精神。”^[30]雅、颂所形成的美颂传统对司马迁产生了重用影响,《史记》的美颂艺术,正是太史公对先秦美颂传统继承的一种体现。

2. 汉代美颂风尚的影响。秦始皇统一天下,威震四方,可惜秦王朝短命而亡,汉继秦而起,成为大一统帝国,汉朝统治者能吸取秦的教训,实现了稳定发展,长治久安,国力强大,气势恢宏。宣扬、歌颂汉德,成为人们的共识。诚如马融《忠经》中对美颂的肯定:“君德圣明,忠臣以荣;君德不足,忠臣以辱。不足则补之,圣明则扬之,古之道也。是以虞有德,咎繇歌之。文王之道,周公颂之。宣王中兴,吉甫咏之。故君子臣于盛明之时必扬之,盛德流满天下,传于后代,其忠矣夫。”^[31]汉代的美颂风尚在文学中有着突出反映。诗歌中的《安世房中歌》《郊祀歌》均以歌颂为主题。作为大汉一代文学之代表的汉大赋,结构宏大,铺张扬厉,润色鸿业,许多作品是以美颂为主的,虽被讥为劝百讽一,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,汉大赋也突出体现、宣扬了大汉帝国的气魄和威势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不仅为汉大赋代表作家司马相如立传,还不惜笔墨收录《子虚赋》《上林赋》《难

蜀父老赋》《哀二世赋》《大人赋》等,体现了司马迁对突出反映汉代美颂风尚的一代文学——汉大赋的重视。歌颂汉德,宣扬大一统,似乎成为西汉盛世情怀的自然流露,而司马迁正处于这种大一统的盛世时代。张新科认为:“武帝时代的大一统政治,使司马迁充满了自豪感……司马迁则要从历史的角度,总结前代兴亡治乱的经验教训,为汉代的大一统社会找到合理的文化源头。”^[32]司马迁及其《史记》创作,不可避免地受到汉代美颂风尚的影响。

3. 最初创作动因的诱发。司马迁创作《史记》的动因是多元的,从最初动因如继承父亲遗愿,肩负修史使命等看,太史公创作《史记》是含有美颂意愿的。《太史公自序》中,从司马谈的临终遗言到司马迁对壶遂所言,能明显的看到司马谈对周公“歌文、武之德”、孔子“修旧起废,论《诗》《书》,作《春秋》”的推崇,以及对“汉兴,海内一统,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”^[33]歌颂的意愿,司马迁认为:“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,有司之过也。”“废明圣盛德不载,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,堕先人所言,罪莫大焉。”^[34]司马迁继承父志,且深刻地意识到了修史的历史使命。司马迁推崇“采善贬恶”——即“惩恶劝善”的传统,“劝善即是颂扬”^[35],颂扬美德善行,颂扬明主贤士,颂扬汉德,这些都成为《史记》的重要内容。从太史公对各篇创作的介绍中,也能看出《史记》创作动因中的美颂意愿。《太史公自序》谈到具体各篇的创作时,对于含有嘉美颂扬之意的人物,直陈其意,如:“维昔黄帝,法天则地,四圣遵序,各成

法度；唐尧逊位，虞舜不台；厥美帝功，万世载之。作《五帝本纪》第一。”“国有贤相良将，民之师表也。维见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，贤者记其治，不贤者彰其事。作《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》第十。”“嘉伯之让，作《吴世家》第一。”“嘉父之谋，作《齐太公世家》第二。”“嘉旦《金滕》，作《周公世家》第三。”“嘉庄王之义，作《楚世家》第十。”“嘉句践夷蛮能修其德，灭强吴以尊周室，作《越王勾践世家》第十一。”“嘉鞅讨周乱，作《赵世家》第十三。”“嘉威、宣能拨浊世而独宗周，作《田敬仲完世家》第十六。”“能以富贵下贫贱，贤能诎于不肖，唯信陵君为能行之。作《魏公子列传》第十七。”“能信意强秦，而屈体廉子，用徇其君，俱重于诸侯。作《廉颇蔺相如列传》第二十一。”“敢犯颜色以达主义，不顾其身，为国家树长画。作《袁盎晁错列传》第四十一。”“守法不失大理，言古贤人，增主之明。作《张释之冯唐列传》第四十二。”“守节切直，义足以言廉，行足以厉贤，任重权不可以非理挠。作《田叔列传》第四十四。”“勇于当敌，仁爱士卒，号令不烦，师徒乡之。作《李将军列传》第四十九。”^[36]等等。从创作动因看，太史公作《史记》，美颂是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。

中国古代文学在长期的发展演变过程中，不免会有一些与实际情况相悖的阿谀奉承之作，这是美颂文学中的糟粕，应该摒弃，而我们对中国古代美颂传统的认识，不能因此就遮蔽了双眼，对美颂全盘否定。其实，中国文学中的美颂传统博大精深，古代著作中不乏合乎实际的褒美之

作，这些美颂是值得肯定的。而更有一些著作，不仅能从实际出发，且能不囿于统治者、世俗及作者自身的好恶，对值得颂扬的人物、事件勇敢真诚地进行赞美，这是令人敬佩的。《史记》正是这样一部令人敬佩的著作，其美颂以实录为基础，大胆真诚而又尊重事实。司马迁遭遇李陵之祸后，在怨愤和苦难中仍然以史家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，对实录原则进行了彻底坚守，《史记》中的美颂和批判共同彰显了太史公实录精神的伟大。这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弘扬和当下道德文化的建设，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//

注释：

[1][12] [汉] 班固：《汉书》第2738、2735页，颜师古注，[北京] 中华书局1962年版。

[2] [唐] 刘知几：《史通》第289页，浦起龙通释，吕思勉评，李永圻、张耕华导读整理，[上海]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。

[3] 陈桐生：《用理想之光照亮历史——简论〈史记·吴太伯世家〉》，载《济南大学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05年第4期。

[4] 杨燕起、陈可青、赖长扬编：《历代名家评〈史记〉》第459页，[北京]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。

[5][6][7][8][9][10][11][13][14][15][16][17][18][21][22][24][25][26][27][28][33][34][36] 司马迁：《史记》第3312、51、2377、95、2519—2521、2031、2731、1947、437—438、2452、2649、3079—3080、2416、3319、338—339、3319、1223—1224、141、141、1027、3295、3299、3301—3316页，裴骃集解，司马贞索隐，张守节正义，[北京] 中华书局1982年版。

[19] 王鸣盛：《十七史商榷》（上）第5页，[北京] 商务印书馆1937年初版，1959年重印。

[20] [清] 赵翼：《廿二史札记校证》第3页，王树民校证，[北京] 中华书局1984年版。

[23] 刘毓庆：《论“雅颂”文学传统——兼论汉民族之善良意识》，载《中国文学研究》1991年第4期。

[29][30] 陈桐生：《史记与诗经》第228、229页，[北京]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。

[31] [汉] 马融：《忠经·孝经》第30页，卢付林注译，[武汉] 崇文书局2007年版。

[32] 张新科：《大一统：〈史记〉十表的共同主题》，载《学术月刊》2003年第6期。

[35] 张大可：《司马迁评传》第144页，[南京] 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。